

导论：旅游与人类学在中国

陈志明 杨 慧

一、旅游与人类学

旅游与人类学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一反早期憎恶旅游对原住民的剥削和商品化 (e. g. Greenwood, 1977) 今天人类学家们不仅意识到旅游对于当地人发展的重要性, 而且还将旅游视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例如, 1999 年《文化遗产季刊》(*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 夏季版 (23 卷, 第 2 期), 《生态旅游专刊》关注的都是原住民的生存。其主题是“通过旅游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土地”。事实上, 旅游甚至可能成为研究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正如欣基·亚玛希塔 (Shinji Yamashita) 在他研究的苏拉位西岛托拉加 (Toraja) 文化所体验的那样, 印度尼西亚的皮卡德 (Picard) (Yamashita, Eades, and Kadir Din, 1997) 在他对巴厘旅游的研究中也表明同样的观点。

旅游的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成为对旅游的研究, 而且也关注几乎所有与人类学有关的课题: 文化变迁、发展、族群性、全球化、地方化、迁移、现代性、认同、表述等等。实际上, 由于后现代对人类学的影响使得旅游的研究与人类学更为相关, 尤其是与现今流行的研究兴趣边缘带 (borderzone)、散居 (diaspora)、混合性 (hybridity)、真实性 (authenticity) 等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当人类学专门对旅游进行研究以来 (Nash 1978、1981; Smith, 1977), 现在已经有许多人类学家发表了好多研究旅

游的文章（见 Crick, 1989, Nash, 1981, 和 Wilson, 1993 等的评论），以及刊载在“旅游研究年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论文，包括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M. Bruner）和尼森·格莱本（Nelson H. H. Grabum）以及其他在该书中的著者。

二、旅游与人类学学者身份和定位的再思考

面对 21 世纪处于正在转型中的社会现实，中国的人类学如何面对这亿万民众卷入旅游的宏大社会事象，如何参与对此进行研究和关注，是克服长此以往人类学研究边缘化的机遇。

众所周知，旅游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渗入，加速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变迁。由于现代意识、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介入，加之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如选择性较大、操作性较为灵活等特点，往往使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开发、运作中呈现出颇具戏剧性的变化，目的地的文化因素很可能在权力操纵之下频繁地被换置、重组，进而至少在诸文化表象上呈现出纷繁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文化景象。然而，社会之发展、变迁，往往是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文化之变与不变，其本质仍取决于民族主体的深层文化内涵。置身其中的人类学者如何调整自我心态与身份，在不忽略以当地人的声音下完成他文化的表述、分析乃至批评，已成为旅游与人类学研究的一大挑战。

旅游因其国际性产业的特征而具有了全球性的力量。而在这种国际性产业发展的冲击下，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变迁景象：宗教生活的再阐释、族群经济、劳力的再分配、权利的失衡、土地的匮乏以及其他更多的文化要素的重组，全球化因素混合于地方文化中。（段颖、杨慧，本论文集）另外，旅游的发展使得传统与现代之交锋在较短时间内完全发生

并广延至文化的各个层面，“变迁”由此产生。而从另一层面上看，它恰恰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交错并行的文化场景，这似乎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人类学者可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通过参与观察体认到区域性社会文化——至少是文化表象上的变化。从而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历时”与“共时”兼而有之的文化表述，进而丰富旅游人类学的表述空间，并为在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具有解释性的民族志依据。

三、旅游与表述及真实性

表述的问题在人类学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任何研究比旅游的研究更明显的了。旅游景点及其当地人怎样向游客表述，以及该表述怎样影响当地人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表述是强有力的，它能激发起人们的情感和对美和“真实”的追求。一个极普通的景点因其被赋予一个有诗意的名称而获得旅游价值的事例，在现实中不无鲜见。例如，四川峨眉山中的一个景点，让人们能透过狭窄的岩石构成的缝隙看到外边的天空，这个景点被称为“一线天”，一条线似的天空，意味着透过狭小的空隙可以观赏上苍。无数的游客，主要是国内旅游者被如此的渲染所吸引，到此一游照相留影。如果没有如此富有诗意的命名，这个景点就如其他的那些地方一样，不可能如此富含意义，正如这地方也并非真正地那样壮观一样。

更重要的是民族群体的表述，特别是原住民族。那些来自城市中心、来自工业化西方——即来自“文明”世界的旅游者渴望眼见那些不同的文化，偏好“原始的”和异国情调的土著居民。他们有一种偏执欲望要想知道和观察其他不同的人类群体，对照于自己拥有的文明的文化，再证实自我的民族优越感。旅游者要想看到异国情调的文化，各种各样的代理商卷入旅游商务之中，

大事渲染异族群和文化的表述以迎合这种口味。例如，云南的摩梭人就是代表。她们被渲染为母权社会，其实她们是施行母系继嗣而非母权（见英文版 Eileen Rose Walsh 的论文）。她们的“走婚”被炒作得使国内外游客的浪漫性欲得到满足，其实只不过是这些游客见了被人说成有松散性关系的原住民。当充满神秘感及好奇心的游客被这些炒作（过分渲染、夸大的表述）吸引到泸沽湖，却发现并非如他们所意想的那样，用他们的表述来说：“这里怎么‘母’^①也不‘母’”？的确，在多数旅游景区“部落”人，尤其他们的妇女，如民族村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及别的地方一样是主要的吸引力。

表述是旅游促销的核心。各种各样的旅游代理商向游客解说一个族群的文化。政府呈现的是生活在统一国家里的不同文化交融的民族主义形象。在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民俗文化村和文化节目单中被介绍为和谐共处。旅行社及导游喜欢随处介绍人们感兴趣的浪漫图景，着重原始的、无拘无束的性行为，美丽的女性等等。所以只要可能，性刺激快感的确是旅游中重要的娱乐项目，这是在旅游促销中被大肆宣传的。特别在民族旅游中，对于男性游客来说，女性总是被当作一个族群和引起性刺激的象征。作为当地人自己，他们也身不由己地卷入自己村寨的旅游促销中而可能也参与炒作这些传奇的故事。的确，就像奥克斯（Oakes, 1998）合宜地描写贵州的一个旅游村寨，这个村寨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比较传统，而是因为村民们“善于表演传统”。然而，那些没有直接从旅游交易中得到好处的大多数村民，并不高兴看到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被“误述”了。但是，如果一个族群的生计主要是依靠旅游，那么旅游业对这些人的文化表述将也不容置疑地影响他们自己的表述。正如娃施（Walsh）指出的那样，现在摩梭男性使用“传统”来解释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不帮助妇女是正当的。

在表述中，导入真实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布鲁纳（1994）讨论了不同的真实性的意义。人们的根本的兴趣在于得到或体验到“真实”，而不是虚假。事实上，在旅游业中描述一种文化或往事时，再制造某些能使人相信的事件比某些事件的真实性往往更重要。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市的沙捞越文化村（Sarawak cultural village），他们的文化表演有相当的专业水准。有个表演者仅只是身着缠腰布以示作为在沙捞越的流浪部落的佩南人（Penan）。表演之后，我待之如友，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伊班人，伊班是沙捞越最大的一个族群。也许是因为不便从沙捞越内陆雇一个佩南人或根雅人（Kenyah）。在文化村里的根雅屋，当地的非根雅侍者表演了根雅的乐器，并讲述了关于根雅的传奇故事。旅游者通常对佩南人和根雅人不了解，所以依然相信他们的“误述”，并且这些人的传奇般的描述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了美好的传说，而旅游者又将这些美妙的故事带回去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

事实上，真实性问题经常被旅游或商品化所引发。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旅游是怎样导致地方文化的再构建。20世纪80年代，当巴巴食物为餐馆所宣传时，许多巴巴人（Baba）^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一群本土华人）表现出对巴巴食物之正宗的关注。事实上，在餐馆宣传之下所提供的食品与在巴巴人家中所烹饪的食物是截然不同的。巴巴人为其作为文化传统的饮食而自豪，同时他们也非常关注饮食文化已被误传，那些餐馆中所出售的食物并不是正宗的。然而，餐馆经营者不得不考虑劳工、成本及缩短准备原料的时间，又或许找不到足够多的原料。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对于游客及非巴巴人而言，他们的宣传是真实可信的。他们真正的对象是非巴巴人。在中国的云南也发生着类似的情况，如丽江著名的小吃“鸡豆粉”就是一例。还有潘守永提及三峡地区的四川“麻”与“辣”的不同地区的文化表述，以及土家

族特色饮食的建构过程的考证等等。^③于此，就仅从中国食品生产的个案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旅游如何导致地方文化的重建。

旅游表述对原住民之印象造成了最大的影响是将他们固定在一个不变的过去。由于大多数原住民无法接近大众媒体，进而无法表述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一直被认为是“部落的”。在所有的以原住民为特征的主题公园，无论是在台湾、沙捞越、深圳、桂林、北京、昆明或是在夏威夷具有如此特性的一些文化村，所有的原住民均穿着“部落的”服装，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已不这样穿戴。在旅游宣传中，马来西亚的佩南人和阿斯里人（Orang Asli）（马来西亚半岛的原住民）被渲染成善于用吹管打猎的人，尽管他们现今已使用猎枪打猎了。过去传统固定的服装和武器被用来将土著民族表述为“他者”和“部落的”或“原始的”，这逐渐成为人们的公共印象，尽管这些原住民——少数民族其实也已现代化了。

然而，在本论集的论文中，爱德华·布鲁纳提出文化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游客，以满足不同兴趣的游客的需要。他指出，在非洲的肯尼亚，私营机构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可信的”原始文化场景，而政府则以剧场的风格主要为国内游客举行了一场国家主义的文化表演，同时另外一个机构则将地方性与全球化混合，使游客以其流浪的经历在全球化中体验地方性以及在地地方性中感受全球化。这就导致了文化因旅游者而生产和重塑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果。不同的机构，从国家到私营企业甚而本土社群均可能被卷入旅游的宣传中，因此在一些独特展示（文化、少数民族、历史名胜等等）之表述的商业中，面对不同层次的游客的不同操作就应运而生，特别是针对国内的与国外的。这里也有关于表述的政治（见科恩，本论文集），还有传统，也可能出于不同机构的争论（如张展鸿之论文）。

四、旅游与人类学国外研究

在论集的第一部分，我们收录了三位著名的亚洲旅游研究专家的论文。他们的文章展示了关于旅游人类学研究之发展进程。虽然他们的研究个案源于他们在亚洲与非洲不同地区所获得的经验，但他们所讨论的论题对中国旅游人类学之发展极为重要。埃里克·科恩已经在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卓有建树，尤其是关于泰国的研究。与本论集许多涉及民族旅游的论文一样，科恩对其颇感兴趣，为此，他对民族旅游作了较为全面的界定。他提倡对民族旅游进行广泛、深入地纵向及横向研究，而中国之研究将有助于此。我们可以将中国政府在旅游开发和管理中扮演的角色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个案的意义在于国家视旅游对现代化与发展的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民族旅游和文化保护的诸多涵义。

爱德华·布鲁纳，原印度尼西亚专家，最近几年在亚洲、非洲及北美洲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理论中颇具影响。他在收入本论集的文章中展现了在肯尼亚，一个族群的表述如何因游客（的需要）而呈现出三个不同的文化场景。这篇论文贡献不但在于提供了一种关于旅游人类学研究方法，而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族旅游的不同观点。同时，它还涉及有关表述的论题，也为理解中国的民族旅游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比较理念。

尼森·格莱本专长于日本人研究，在论集中，他对日本与中国的旅游和人类学研究作出了极为有益的比较。他关于怀旧的讨论为中国的旅游研究提供了一条便利的途径：对传统中国的向往，对自然与人性的回归，以及对毛泽东时代与社会主义的追忆。怀旧并不意味着期望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体验过去的某些方面，而使人们增添一种根深蒂固的、具有稳定性和现世观点的现实感”（but to experience aspects of the past which lend to the present

qualities of rootedness, stability and a temporal perspective) (格莱本本论文集)。在英文论集中,^④韩敏提供了一个在韶山毛泽东旅游开发中关于对毛泽东怀旧的较为有趣的个案研究。在此,对毛泽东的怀旧以及日益增长的将其作为中国英雄的神话(有人甚而将其神化)为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商机。事实上,毛氏餐馆出售的湖南风味菜肴以被当作毛泽东所食之菜业已风靡全国。我们也可看出,怀旧作为人们拥有的一种对特定时空所寄予的感情,它对于现今生活(肯定的或是批评的)及其身份的定位也是意味深长的。这对于国内外的中国游客尤其重要。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中国人,在关于中国历史及文学的学习中,对中国的过去及名胜或多或少有所了解,自然也认识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内涵。因此,风景名胜及历史建筑的游览将使其亲眼见证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进而将其已经了解的一些中国传统和他们现在于此的经历合而为一。

五、旅游与族群认同、地方文化再建构

旅游,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通过具有民族历史价值的人文旅游景观的再现和重组,一方面展示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智慧和创造力,重新唤起了本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内聚力和自信心及自豪感;另一方面,也使得主流文化群体的游客在民族旅游中获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新的认知和再认识,由此对这些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群体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得到肯定和新的评价。总之,在这一过程中,旅游推动着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并得以不断地展现。

与此同时,每一个民族都在旅游大潮中开始重新塑造自我形象,强化族群认同。旅游与丽江纳西族意识认同的互动就是一个

较典型的例子。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衔接地带，是滇西北多文化的融合点，在历史上长期与其他族群的交往和交流，形成了汉、藏文化和纳西本土文化三位一体的独特文化。丽江被称为人类文明活化石的纳西东巴文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以及象征着纳西民族精神的玉龙雪山都被纳西人视为丽江旅游的灵魂，从政府到民众都认为深厚的纳西文化底蕴是发展丽江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明确提出将丽江建设成“民族文化强县”的口号。丽江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民族旅游的热潮唤起了纳西人对本族群文化的热爱和再认同。纳西东巴文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急剧变迁，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纳西东巴文化的关注促成了纳西文化的复苏，尤其是旅游的开发，为人们视为神秘深奥的纳西东巴文化，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吸引国内外游客、推动纳西族地区旅游大潮的主要文化因素（杨福泉，本论文集）。这一切与纳西人力图在旅游开发中再现种种已经和正在消失的东巴文化分不开，而其中纳西人努力再建构自我族群认同的内趋力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最富有象征意义的纳西族形象再建构莫过于 1999 年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大展演。其间动员和汇集了几乎全国乃至世界的纳西族以及对纳西文化有认同感的各界精英，参与该艺术节的出谋划策和全过程的操演和实施。纳西大型文艺《东巴魂》和《纳西古乐》令人耳目一新的表演，纳西东巴文化祭天、祭风、祭曙三大仪式向游人的展示，重建与再现纳西人昔日辉煌木氏土司府的剪彩，艺术节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热烈而激情的发言等等，从民俗、艺术、宗教、建筑、学术等角度全方位地展示纳西文化的独特性、奇异性和隐含其中的族群意识^⑤，并且借以塑造新的纳西族群形象和自我表述，以及象征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纳西文化中交汇、融合的不同表述。这一切使得纳西族在云南旅游开发的特定场景中，象征性的族群意

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得以强化，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得以传承、延续、发展。

旅游在重建人们文化自主权上有着积极的意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到“本文”（生活现实中的本来面目），而非通过“文本”（经过先期的社会价值附丽）去诠释。这才是文化自主权的现实生成。在当今的社会中，旅游越来越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无论它是一种时尚，一种休闲，一种身心调适，一种社会知识的获得渠道，一种修养，一种消费，一种节奏转换，一种健康需求……它都构成了社会价值系统中“文化自觉”的有机部分”（彭兆荣，本论文集）。另外，国内风行一时的旅游“快餐”——人造景区，在一定程度上对强化民族和传统文化认同也取到一些积极的作用（瞿明安，本论文集）。历史记忆如何帮助一个族群发现可作为旅游资源的人文景观，而这些人文景观又反过来服务于该族群的文化形象的再塑造，作为中国满族的一员白莲提供了她的研究个案（白莲，本论文集）。

六、旅游、文化保护与发展

在旅游、文化保护与现代性间存在着三重的关联。通常因其文化、历史或自然环境所具有的旅游发展价值，而激起了私营的资本主义企业之贪欲或引发了政府对“发展”的现代化热忱。而文化保护则经常被开发商及一些官僚视为其实现现代发展之努力的障碍，而旅游服务则被视为一种关于保护可被接受的逻辑，尽管通常是作为不情愿的让步。例如，在香港，政府对寺庙和宗祠保护的目的在于利用其价值来实现地方及国际性的旅游（张展鸿，本论文集）。又如蓝·查普林（Ian Chaplin）和他的同仁所描述的（英文论集），在后葡萄牙时代澳门文化的保护似乎在于它对发展民族旅游的功效。在英文论集中，约翰·尼森（Johan Nils-

son) 和谭莹 (音译) 为我们展示了福建泉州的旅游发展与保护。正如他们所指出的, “当试图改善城市环境的其他方面并使之现代化时, 泉州与其他城镇一样正处于不可挽救之破坏的危险中。” 幸运的是, 旅游的经济意义已使当局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例如, 香港旅游协会即提倡发扬“绿色旅游”及将香港作为一座“历史城市”(见其刊物, 冬季卷, 1999)。这个协会积极提倡古迹旅游。又如约翰·尼森和谭莹在泉州个案中讨论的, 对于在宣传旅游的同时又保护历史遗迹而言, 古迹旅游不失为一种廉价甚或有利可图的方法。它可将历史城市现有的资源转化为资本。另外, 方百寿以泉州洛阳桥景区的开发与保护的论文中提及古建筑的保护, 新添项目如何与原有景观相互协调, 历史名人的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 民俗表演的创作成分, 主客之间如何在当地文化上达成共识等, 都在论文集中涉及。

然而, 文化保护不仅仅是保存一些建筑物。正如白海思 (Heather A. Peters) 指出的, 我们还需要关注依靠旅游的一个城镇或聚落的全面保护。在丽江, 无限制的国内旅游扩展已经对当地人民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因商业而暂住于此的外地人已对地方文化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包括污染的增加。身着纳西服饰的地方妇女不得不忍受游客在没有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为其拍照。旅游业已影响到当地人民的自尊。(查尔斯·麦克汉也持同样的观点, 英文版) 与此同时, 当地人民发现他们并无能力影响旅游的决策、管理。代理机构只对游客负责而对城镇的修缮及清理污染全无益处。从其人类学工作及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的经验中, 白海思提出一些利用旅游收入完成保护的有益的见解。我们完全同意她的建议, 即生活在历史名胜地区的社群“必须有自己的声音”。他们与其被人忽略及因在保护自己家乡上没有发言权而被认为无助于此, 不如给予机会参与进去而成为决策、管理的一部分。

当然，当前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保护与发展”问题，还牵扯到旅游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诸如发展商对开发地的“过度开发”或“随意杜撰和改变”的危险，少数民族在旅游开发中不仅好处甚微，而且在伴随旅游而来的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散失了自我等等。“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在中国境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民族旅游”拓宽了当代中国旅游业的“产品”范畴和客源种类，有利于境内外市场的未来竞争；“旅游民族”的出现则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份以及各自不同的文化分野。由于“开发”在目的上的短期功利色彩以及参与“开发”双方之主体的不对等，“旅游民族”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被包装”）状态。他们的想法和声音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干扰和扭曲”（徐新建，本论文集）。因此，在旅游的开发中不仅要考虑当地人的想法和声音，还要让当地人分享旅游所带来的好处。如果很少考虑当地居民的要求和对他们的困难视而不见，让大多数居民眼睁睁地看到旅游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自己却不但不能从中受益，反而还要忍受由于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承担旅游发展的各项成本（包括环境、社会成本等），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抵制、消极和敌对情绪，甚至对抗行为。^⑥这在世界旅游发展过程中不乏其例。

七、 结 语

在本论集中，许多论文均涉及民族旅游。它对于维持旅游发展与当地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急需研究旅游如何不仅为国家，而且也为受其影响的人民带来经济收益。就此而言，开发生态旅游也很重要，生态旅游即指“基于自然和不破坏生态的旅游和娱乐”（Lindbery and Goulding, 1997）。生态旅

游不仅关注于保护，而且也包括当地人民并确保旅游发展同样对当地社区有益。中国有很多自然资源，这对于生态旅游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正如吴大华、徐晓光在其关于贵州的旅游研究中所描述的，理解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地方文化行为也较为重要。事实上我们需要对旅游进行综合的研究，将生态旅游、民族旅游、文化旅游等合而为一。在其中我们不仅仅只关心国家和商业机构的收入，而且要关注于保护与地方参与的意义以及当地社区的利益。由此出发，相应的，如卢西诺·密纳彼（Luciano Minerbi, 1999）所言及的关于旅游和夏威夷的土著，“旅游应该是小规模，具有生态和文化导向的，及更多属于本土的。”其结果并不仅仅是保护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当地人民在何种程度上能受益于此。把当地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旅游的经济利益之外将是不公平的。就此而言，原住民组织各自的社团，如陈志明（Tan, 1997）所指出的，将有益于表达他们的公共利益。

在中国的旅游管理中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一些地方的分权是必要的，这样，地方社区和旅游管理机构在政策和管理方面即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他们也应多分配到一些旅游所得到的收入。还有，持续上涨的旅游地门票不仅仅涉及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关系到国内游客的平等和利益。旅游者的安全和权益也应受到保护。在会后，我们于 1999 年 10 月 2 日游览了石林，使我们感到震惊。国庆节以及世博会使游览石林的游客剧增，使得对游客无法进行控制，石林非常拥挤，以致于无法向周围移动去观赏风景。我们和同伴决定离开，而仅仅从人群中挤出来就花了我们不少的时间和气力。当我们问及随后游览的朋友时，便和他们戏言，我们虽去了石林，但看到的仅仅是人山人海。到丽江旅游的高峰期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之体验。

对于中国旅游的研究不仅有益于我们理解中国旅游的多样性，（田里，本论文集）东西部社会发展问题（石硕，本论文

集)，而且有助于有关理解社会论题的理论之发展。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和自然资源及对现代化与发展的关注为旅游及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素材。旅游的人类学研究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它仍然受到一定的约束并且鲜为人知。格莱本在其论文中已将日本纯学术性的研究与中国的应用性研究加以比较。如南方的其他国家，中国的人类学发展必须使国家及社会相信它至少与现代化和发展的讨论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和发展机构甚至许多地方社区业已看到旅游对于现代化和发展的的重要性。因此，进行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的中国人人类学者及研究者便有机会向政府及公众表明人类学与旅游研究的相关性。就此，它也为改变以往人们认为人类学即是研究早期原始人类的头骨和骨骼的看法，重新理解人类学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因此，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于 1999 年 9 月 28 日~10 月 1 日在昆明联合举办“人类学、中国社会与旅游”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不无益处的。介于旅游在云南的重要性，如民族旅游或是生态旅游，它体现出关注旅游人类学对于在云南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意义。这将使我们关注于人类学的发展及研究人员和基金的缺乏，而相对于发展其他人类学分支学科及与中国其他人类学研究机构竞争而言，旅游人类学在云南更具实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南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将因其在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特殊作用而广为人知，也将因此为中国人类学之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建立有关的图书收藏，组织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及其他一些学术活动（包括座谈会及学术会议）。相关的专门研究如影视人类学也要有所加强、巩固。当聚焦于旅游及旅游人类学时，正如文章开始所指出的，与人类学相关的研究范畴应是广泛而多元的。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可关注一系列的论题。对于民族旅游和生态旅游的系统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另外，

除了旅游的广泛论题，族群与生态适应，也可作比较研究，例如，对贵州和云南的旅游村落作比较研究。旅游者的计划、管理及他们对族群及其经济的冲击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于此，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旅游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值得我们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包括国家的角色在内的多维度旅游和发展，将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旅游与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将会有很多机会去研究如传统（包括传统的重构）、表述、真实性和文化变迁等论题。

注：

意即：走婚。

巴巴是 *baba* 的音译。

选自《读书》1998. 9。

该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中文和英文且较多，故分别以中文版（由云南大学）和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式出版。

景宜：《节日与生存》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⑥杨慧：《旅游发展与云南丽江古城命运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References

1.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 Bruner, Edward M., 1994: *Abraham Lincoln as Authentic Re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6 (2).
3. Bruner, Edward M., 1996: *Tourism in the Balinese Border-zone, In Displacement, Diaspora, And Geographies of Identity*. eds., Smadar Lavie and Ted Swedenbur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4. Crick, Malcolm, 1989: *Represen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un, Sex, Sights, Savings, and Servil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

5. Greenwood, Davyyd J., 1977: *Culture by the Pound: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ourism as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In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ed., Valene Smit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6. Hitchcock, Michael, Nick Stanley and Siu King Chung, 1997: *The South-east Asian "Living Museum" and its Antecedents*. In *Tourists and Tourism*, eds., Simone Abram, Jacqueline Waldren and Donald V. L. Macleod, Oxford, New York: Berg.

7. Keyes, Charles F., 1997: *Cultural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ailand*. I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eds., Michael Brown and Sumit Gangul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8. Kim, Kwang Ok, 2000: *Contested Terrain of Imagination: Chinese Food In Korea*. In *Changing Chinese Foodways In Asia*, eds., David Y. H. Wu and Tan Cheebe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9. Li Ming, 2000: *Survey Says More Beijingers Taking Trips*. *China Daily* (Hong Kong), April 24, 2000.

10. Lindberg, Kreg, and Carmel Goulding et. al. 1997: *Ecotourism in China: Selected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Martin Oppermann, Oxon, UK: CAB International.

11. Luciano Minerbi, 1999: *Tourism and Native Hawaiians*. *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 23 (2).

12. Nash, Dennison, 1978: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Tourism*. In *Tourism and Economic Change*, ed., Valene L. Smith. Wil-

liamsburg: William and Mary Press.

13. Nash, Pennison, 1981: *Tourism As An Anthropological Subject*. *Current Anthropology* 22.

14. Oakes, Tim, 1998: *Tour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15. Peng, Wenbin, 1998: *Zhongguo Minsu Luyou de Fazhan ji Zhongguo Xueshujie de Canyu Qushi*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lk Tourism and the Trend of Participation of China's Academia*). In *Renleixue yu Xinan Minzu* (*Anthropology and the Peoples of Southwest China*), ed., Wang Zhusheng.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16. Picard, Michel, 1996: *Bali: Cultural Tourism and Touristic Culture*.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17. Shen Zuxiang, ed. 1996: *Tourism and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

18. Smith, Valene L., ed. 1977: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 So, Antoine, 2000: *Holiday Crowds Sail Through Checkpoin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 2000.

20. Tan Cheebeng: *Indigenous People, The State and Ethnogenesis: A Study of the Communal Associations of the "Dayak" Communities in Sarawak, Malay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8(2).

21. Wilson, David, 1993: *Time and Tid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In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eds., Michael Hitchcock, Victor T. King, and Michael J.G. Parnwell. London: Routledge.

22. Xu Gang, 1999: *Tourism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Case Studies of Guilin, Suzhou and Beidaihe*. UK: Curzon Press.

23. Yamashita Shinji, J. S. Eades and Kadir H. Din, 1997: *Intro-*